

· 理论研究 ·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能否促进社会公平？

——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政策效应评估

洪竞科¹，郑琪¹，刘炳胜²

(1. 重庆大学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重庆 400044; 2. 重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400044)

摘要：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设立所蕴含的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理念，在时空维度下对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不容忽视。鉴于此，本文从机会均等和结果公平的双重视角，以实验区设立这一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20年1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设立对当地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设立能够缩小当地城乡收入差距。其次，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设立对胡焕庸线以东南地区实验区和绿色生态型实验区在结果公平改善方面的正向作用更明显。再次，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设立通过提供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等机制保证机会均等，间接提升结果公平，但基础设施这一作用机制并不显著。最后，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设立通过时空层面的调节效应，以更加公正的方式实现社会公平，起到了二次公平的效果。本文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

关键词：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可持续发展；机会均等；社会公平；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

中图分类号：F0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3)11-0015-16

一、引言

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1]。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也产生了社会发展滞后、贫富差距拉大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社会不公平问题。经济水平和收入水平的稳步提升并不能自动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保障每个人基本发展权利的机会均等才是改善社会公平的根本途径^[2]。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各界对社会公平的重点关注领域也逐渐从如何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等经济发展领域，扩展到如何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社会发展相关领域^[3]。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新

收稿日期：2023-07-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可持续区域系统合作研究项目“基础设施促进城乡融合可持续发展的驱动机理与决策机制研究”(T221101034)；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基建促进区域平衡充分发展的长效机制研究”(21JZD029)

作者简介：洪竞科(1986-)，男，四川成都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城市资源管理与政策研究。E-mail: hongjingke@cqu.edu.cn
郑琪(2000-)，女，重庆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研究。E-mail: 770237693@qq.com
刘炳胜(通讯作者)(1979-)，男，天津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治理、可持续建设管理与政策和资源环境管理研究。E-mail: bluesea_boy_1979@163.com

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需求, 中国政府将促进社会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不断健全了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通过履行再分配职能和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一系列举措, 进一步加强对社会公平的调节作用。从新时代中国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建设发展过程来看, 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建设已成为中国政府在发展中改善民生、保障民生, 将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的重要抓手。

可持续发展旨在实现高质量协同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 这将有助于改善社会公平, 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状况。实际上, 社会公平位于可持续发展金字塔的顶层, 是人类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最高层次^[4]。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时曾强调, 社会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5]。1987年, 该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 “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而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其具有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两个维度的丰富内涵。2015年,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已基本实现, 193个成员国在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正式通过17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其高度重视社会发展与公平问题^[6-7]。其中, 以SDGs减少不平等的相关研究为主要内容^[8]。

作为一项地方性可持续发展综合示范试点工作,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脱胎于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 建设目标之一是为促进当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契机。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管理办法》《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规划大纲》《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工作指南》等相关文件规定, 实验区重点关注社会领域发展, 包括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业, 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实验区通过提供城乡居民均等的发展机会, 调整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缓解社会矛盾, 解决社会问题, 共享发展成果, 最大限度地保证和提高当地社会公平程度。总的来说, 实验区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百姓收入普遍提高,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卫生、医疗和生态环境等得到改善, 社会发展水平得到提高, 成为中国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从理论层面上看, 可持续发展理念包含减少不平等, 改善农村的不利条件, 实现区域内城乡可持续发展, 促进社会公平。然而, 当前对社会公平的定性或定量研究聚焦于社会公平中的物质公平, 即将收入分配公平作为描述社会公平最终结果的主要指标, 而忽视了产生结果公平的具体作用路径。实际上, 机会不均等作为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源^[9], 是人们获得平等发展权利的主要障碍。但是, 当前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公平的作用机制仍不清晰, 尚不能全面回答其相关手段是否能够保障人民群众发展权益的机会均等。因此, 揭示机会均等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具体作用路径, 是探明可持续发展影响社会公平演化规律的应有之义。更为重要的是, 相较于累进税制等传统推动社会公平的举措, 基于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结果公平和共享原则下的机会均等理念蕴含着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的丰富内涵。具体而言, 代际公平强调时间尺度上的公平追赶, 即通过加速公平进程, 破除深度不公平地区的“不公平锁定”陷阱。代内公平则强调空间尺度上的公平, 即发挥相关政策对欠发达地区的倾斜作用, 通过包容性和益贫性发展, 改善区域不平衡发展的社会不公现状。换言之, 可持续发展理念应具有二次公平的特征, 即通过时空层面的调节作用, 以更加公正的方式促进社会公平。因此, 探索并检验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改善初始城乡不公平和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过程中的二次公平效应尤为重要。从现实层面上看, 实验区作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试验田, 将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然而, 当前相关研究重点评估了实验区设立对当地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作用, 而对其改善社会公平的效应尚语焉不详, 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验证实验区设立能否通过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改善结果公平和实现二次公平, 将从实证层面为中国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鉴于此, 本文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 对实验区设立在社会公平发展方面的政策效果进行定量评估, 尝试回答实验区的相关政策措施能否通过提升机会均等, 促进社会公平, 并进一步验

证实验区所采取的一系列再分配手段是否解除了“不公平锁定”陷阱,对实验区间不平衡的城乡收入现状起到了二次公平的政策效应,进而为实验区推广提供有力的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

本文可能的学术贡献在于:首先,在识别策略上,本文系统考察实验区设立对促进当地社会公平的影响,拓展了该试点政策在社会公平领域的实证研究范畴,弥补了已有研究视角的局限性。其次,本文深入探讨了实验区设立通过完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险等措施保障居民发展机会均等,从而完善实验区内影响城乡收入分配格局的具体作用机制,丰富了实验区促进社会公平的理论 and 实证研究。最后,考虑到实验区间社会公平的不平衡发展现状,本文进一步探索并验证了相关政策对初始城乡收入公平程度不同的实验区和实验区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收入公平的政策作用差异所导致的二次公平效应,为实验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

(一) 有关社会公平的相关研究

关于社会公平,部分学者从概念辨析出发系统梳理社会公平的主旨要义、发展脉络和政策内涵。俞可平^[10]认为,社会公平是指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地分配政治、经济和其他利益,意味着权利平等、分配合理、机会均等和司法公正。郑功成^[2]提出,社会公平是一种价值判断,是社会过程中人们就业、受教育、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等权益失衡问题导致了人们公平感较弱,亟须立足保障权益机会均等这一价值追求,寻找一条维护社会公平的根本出路。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社会公平更是社会政策的核心价值所在^[11]。

目前学术界就如何测度社会公平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从现有文献不难发现,社会公平具体体现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等维度^[12-14],社会公平的多维特性导致定量测度难度较高。其中,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的经济利益体现,也是落实到人民手中可度量的权益,更是最为直接、最易观测到的结果公平。因此,过去学术界往往把实证分析的焦点放在易于测度的分配公平上,在税收^[15]、消费理论^[16]、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17]等领域深入探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促进社会公平绝不仅仅是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更需要赋予人民平等发展的能力和权利,即保障机会均等。一般来说,无论是国家、地区还是个人,目前不平等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获取资源的不平等^[18]。因此,健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实现机会均等尤为重要,特别是对于农民和贫困地区的弱势群体。董丽霞^[19]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剥离个人努力因素,从环境机会不平等这一结果不公平的关键来源出发分析收入不平等,强调国家通过政策调整来促使收入机会更加公平。周小亮和吴武林^[20]从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五个领域构建指标体系,测度机会均等这一促进社会公平的关键路径的水平。

尽管学者对社会公平的内涵莫衷一是,但都认可其具有平等、包容的特征。社会公平作为可持续发展“3E”要素之一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并进一步探索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21]。但遗憾的是,鲜有文献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分析并验证机会均等这一改善社会公平的具体作用路径和实现二次公平效应。实际上,社会公平同时体现为机会均等和结果公平。其中,机会均等重视过程,收入公平则强调结果。而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同时实现在空间维度下的代内公平和时间维度下的代际公平^[22],这与二次公平理念,即以更加公平的再分配手段保障机会均等,实现结果公平,更好地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改善区域城乡社会发展不平衡现状的内涵高度契合。因此,笔者认为,实验区能通过发展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和基础设施,赋予城乡居民平等的发展权利,以更具公平性、可持续性的作用路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改善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从而在时空维度上实现二次公平。此外,在中国,政府是协调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之间关系的主体^[23]。保障机会均等和结果公平同为公共政策问题,必须充分

发挥以政府为主导的再分配功能, 通过制定符合公平正义的政策法规, 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 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 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发展。

(二) 有关实验区政策评价的相关研究

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领域最早开展的公共政策试点工作, 实验区的实验主题丰富、覆盖范围广泛, 切实推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 补齐了中国社会事业发展的短板^[24]。对实验区建设情况进行评估是加强实验区建设和管理的重要前提, 围绕此次试点, 学者们就某一地区的实验区进行政策效果相关研究。其中, 彭乾等^[25]以天津市为例, 系统分析了市内三类实验区的建设思路并进行模式设计, 提出了未来建设的主攻方向。李俊莉和丁桂英^[26]从经济、社会、环境和科技四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 核算山东省日照市实验区各系统的可持续指数、水平指数、协调度指数和协同度指数。受到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 当前对单一地区实验区政策的相关研究集中于其建设思路、发展方向和评价当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就政策评价工具而言,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下文简称“科技部”)于2001年推出了《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管理办法》, 确定了实验区规划主要参考指标, 但该指标发布时间久远, 普适性较差。因此, 有学者试图构建适用性更广的评价工具进行横向对比研究, 以探索政策效果。张晓彤等^[27]从不同城市的发展特点出发, 构建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比较了4个实验区在6种不同情景下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黄钰乔等^[28]基于熵值法、主观赋权法、灰色聚类法和序参量法构建5种不同权重的指标, 评价了实验区政策在全国25个地级市型实验区的实施效果。

近年来, 公共政策评估领域受到广泛关注, 学者们使用双重差分法、合成控制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等方法对政策效果进行科学评价, 研究方法逐渐普及^[29]。笔者进一步梳理相关文献发现, 目前使用以上方法对实验区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价的实证研究较少且内容局限于对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的检验, 如刘炳胜等^[30]基于中国20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实验区政策试点与提升当地可持续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尽管现有研究围绕实验区政策开展了系统分析, 但其对改善当地社会公平的作用机制尚未明晰, 也鲜有文献针对实验区政策对社会公平的影响进行实证探究。事实上, 可持续发展理念寻求发展动力、发展质量和发展公平的有机统一^[31],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实验区建设也重点关注社会公平问题。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前身为国家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 二者的建设理念一脉相承。实验区深耕社会发展领域, 针对城市化带来的问题, 如劳动力转移、就业压力和社会保障等, 不断改善社会发展基础设施条件, 加大社会配套改革力度, 推动社会事业的全面稳定发展^[32]。然而, 实验区设立对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效应尚未通过科学评估的研究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综上所述, 虽然已有文献对实验区政策试点进行了初步的政策效应评价, 但相关研究或针对单一地区采用案例研究法开展质性研究, 或是构建指标体系从多维度对实验区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鲜有基于大样本数据开展政策效应评价。同时, 当前针对实验区促进社会公平的研究还相对匮乏, 相关学者未能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究和实证检验, 尚未有研究验证实验区设立对促进社会公平的多重作用机制, 尤其是相关试点政策如何通过提升机会均等以改善结果公平, 实现实验区间的二次公平。基于此, 本文将实验区设立视为准自然实验, 使用2004—2020年1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探索20个地级市型实验区设立在当地社会公平方面的政策净效应, 进一步使用机制模型分析机会均等促进社会公平的具体作用机制, 并针对二次公平效应进行相关检验。

三、政策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政策背景

实验区的试点工作是推进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为缓解社会不公平现象, 1992年5月, 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等国务院28个部委及团

体批准成立全国首批国家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在推动地方社会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国务院于1994年颁布并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此后三年,国家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围绕可持续发展有序开展相关工作,实验区初具雏形^[32]。1997年,国家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正式更名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自此开始,科技部陆续组织制定并发布了《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管理办法》《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工作指南》,进一步明确实验区工作的建设目标和管理措施。进入21世纪后,实验区的发展进入扩张期,3/4的实验区在此阶段获得批准,在深度与广度上继续拓展^[30]。2016年12月,国务院印发《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推动落实2030年联合国设定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实验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截至2016年,中国已累计批准建设了189个实验区,涵盖地级市型、县域型、城区型和乡镇型在内的各种类型,遍及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4]。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实验区设立往往被赋予不同主题。其中,社会发展、城乡一体化和小城镇建设等城乡相关的主题是众多实验区主题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在实验区面对的诸多发展问题中,资源分配不均、社会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不公平现象,导致社会不稳定和不可持续发展。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二元特性,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在波动中不断拉大,成为社会不公平的根源之一^[33]。在众多类型的实验区中,地级市型实验区通过不断完善经济结构和社会基础设施条件,加大社会配套改革力度,在社会发展领域进行全方位实验,实现了实验区内社会层面的可持续发展^[34]。需要注意的是,地级市型实验区的设立范围为整个地级市,其政策效应可同时作用于市辖区及其下辖的县镇乡,因而可同时促进城市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互相支撑、优势互补的关键^[35]。其中,作为实验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区在建设过程中聚焦农业、农村发展,形成了5种典型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补齐了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短板^[36]。农村可持续发展对乡村振兴意义重大,既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繁荣的动力源泉,又是保证脱贫工作平稳向前推进的稳定器,更是使农民享受发展成果的必由之路,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重要抓手^[37]。由此看来,实现城乡可持续发展,改善城乡二元收入分配格局,是实验区设立的应有之义,也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支撑。同时,城乡收入差距能够反映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水平和经济增长的环境,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测度指标^[38]。因此,本文从城乡收入差距视角出发,通过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实验区设立是否缩小了实验区内的城乡收入差距,改善结果公平。据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 实验区设立能够缩小当地城乡收入差距。

实验区在建设过程中以建设城乡配套措施,发展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险为手段,帮助城乡居民获得公平的机会和资源,保证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实现了可持续发展^[39]。而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险等再分配手段能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生活需要,通过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来缩小城乡差距^[40]。由此可见,实验区通过机会均等路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结果公平。

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对提高农民素质和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41]。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拉大与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低下、基本公共服务匮乏关系密切^[42]。其一,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发展是导致区域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源之一^[43]。发展教育事业,解决教育不平等可以提高劳动力质量和实现人力资本积累^[44],有效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科技部在《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工作指南》中指出,实验区要重点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加强两基工作,推广素质教育。此外,医疗卫生服务向城市倾斜,导致城乡居民的健康和人力资本不平等,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45]。为有效提高人民医疗保健和卫生水平,实验区将“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列入其规划的主要参考指标之一,通过中期评估和阶段检查对实验区实施动态评价和管理。医疗卫生基本服务均等化提高了医疗公平

程度, 初步解决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有效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其二, 促进社会公平的关键是关注贫困弱势群体, 这是底线公平的体现。《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规划大纲》中多次强调, 要做好优待救济工作、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收入差距具有调节作用, 通过收入再分配, 实现“维护社会公平、促进人民福祉、实现经济成果共享”的政策目标^[46]。其三, 实验区全面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以提高城镇基础设施配套率和社会服务设施配套率为目标。基础设施能够改善交通可达性, 便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获得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 具有减贫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作用^[47]。因此, 实验区将发展理念与具体行动统一到赋予人们发展机会均等这一价值追求, 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为核心, 通过确保公平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和基础设施, 改善城乡居民获取机会不均等的现状, 实现实验区城乡收入的合理分配。据此, 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 实验区设立通过发展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和基础设施的机会均等路径, 促进结果公平。

实验区设立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为改善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社会公平状况提供有力保障。实验区因建设水平差异而表现出来的层次性, 是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的问题, 而这种发展水平的层次性可能会因为发展过程中的不公平、不平等而引发或加剧。可持续发展理念蕴含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的价值追求, 面对实验区间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 实验区政策会改善实验区间存在的层次性, 对不同状态的实验区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偏向性会带来二次公平效应。研究证明, 减贫的成效取决于当地的初始不平等程度^[48]。考虑到减贫、不平等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密切联系^[49], 笔者认为, 不同地级市设立实验区改善结果公平所存在的差异性可能会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 设立实验区前, 当地本身的收入公平程度, 即初始城乡收入公平程度。初始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和动荡, 反过来使整个社会不公平程度加深, 陷入与“贫困锁定”类似的“不公平锁定”陷阱。另一方面, 实验区经济增速的快慢差异。实验区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 由于实验区政策所具有的包容性、益贫性, 对结果公平的改善作用有偏于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 从而带来减贫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双重红利, 实现城乡的可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因此, 在实验区建设过程中, 试点政策在初始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经济增速较低的实验区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 这有助于实现实验区间收入分配的二次公平。据此, 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3: 实验区设立能够改变初始城乡收入不公平的锁定状态, 并对经济增速较低的实验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更强, 产生二次公平效应。

四、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及样本选取

本文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EPSDATA数据库。其中, 个别样本缺失值, 结合地方省市统计年鉴、地方统计公报或者采用插值法进行补齐。此外, 基于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的时间窗口选择为2004—2020年。在实验组的筛选上, 本文剔除了2004年前设立的地级市型实验区与下辖县和城区中存在实验区试点的地级市。另外, 对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西藏自治区所有地级市、儋州市、三沙市、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等地级市和存在行政区划变化的毕节市、铜仁市等地级市进行删除处理。据此, 筛选出的2004年后设立的20个地级市型实验区为实验组, 其余159个未设立实验区的地级市为控制组。最终, 本文使用2004—2020年179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

(二)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

借鉴王志江和胡日东^[50]的做法, 本文采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度量城乡收入差距(CV):

$$CV = \frac{\sqrt{\frac{\omega_1}{1-\omega_1} \sum_{i=1}^2 \omega_i (x_i - \bar{x})^2}}{\bar{x}} \quad (1)$$

其中, $i = 1, 2$ 分别为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 ω_1 和 ω_2 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口比重; x_1 和 x_2 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bar{x} = \sum_{i=1}^2 \omega_i x_i$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分别用城市和农村 CPI 指数进行消胀处理, 城镇居民的人口比重为城镇常住人口占常住总人口的比值。为了后续稳健性检验, 本文借鉴张嫫和方天堃^[51]的做法, 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值的自然对数表示城乡收入绝对差距。

2. 解释变量: 实验区设立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实验区设立 (did)。did 为政策试点虚拟变量, 用 $policy_i$ ($i = 1$ 为试点城市, $i = 0$ 为非试点城市) 与 $period_t$ ($t = 1$ 为政策试点后, $t = 0$ 为政策试点前) 的交互项衡量。对试点时间虚拟变量进行如下处理: 实验区的批准时间为 t 年 1—6 月时, 该城市在 $t - 1$ 及之后的年份中取值为 1; 当实验区的批准时间为 t 年 7—12 月, 该城市在 t 年及之后的年份中取值为 1。

3. 机制变量: 基础教育 (Edu)、医疗卫生 (Med)、社会保险 (Insur) 和基础设施 (Infra)

本文用每平方千米中学数、每平方千米小学数、生均小学教师数和生均中学教师数衡量地级市的基础教育; 用每万人医院数和每万人病床数衡量地级市的医疗卫生; 用养老保险覆盖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和失业保险覆盖率衡量地级市的社会保险; 用城市路网密度和万人公共汽车数衡量地级市的基础设施。此外, 考虑到各维度机制变量的相应表征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本文参考夏怡然和陆铭^[52]的方法, 对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和基础设施 4 个变量分别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处理, 以减小可能产生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4. 调节变量: 初始城乡收入公平 (OriCV) 和经济增长过程公平 (pgdpr)

用设立所有实验区之前当地的变异系数衡量当地的初始城乡收入公平; 用人均 GDP 增长率衡量实验区的经济增长过程公平。同时, 为避免初始变异系数波动较大带来的影响, 本文用 2001 年、2002 年和 2003 年变异系数分别作为 OriCV 加入回归, 以增强结果的稳健性。

5.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张延群和万海远^[53]、陈斌开和林毅夫^[54]与葛继红等^[55]的做法, 选取以下变量进行控制: ① 经济发展水平 (lngdp): 考虑通胀因素对实际数据的影响, 本文用经过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平减处理后的实际 GDP 自然对数来衡量。② 产业结构 (struc): 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衡量。③ 政府规模 (gov): 用政府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 GDP 的比值衡量。④ 对外开放水平 (open): 用货物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值衡量, 货物进出口总额依据当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进行换算。⑤ 固定资产投资 (far): 用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当年 GDP 的比值衡量。⑥ 储蓄能力 (save): 用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与 GDP 的比值衡量。

(三) 模型构建

由于在实验区试点工作中, 实验组受到政策冲击的时间点不一致, 为探究实验区设立是否缩小当地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评估:

$$CV_{it} = \alpha_0 + \alpha_1 did_{it} + \alpha_c Control_Var_{it} + City_i + Year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i 和 t 分别为实验区设立的城市和年份; 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 CV 为不同城市的城乡收入不公平程度; 解释变量 did 为实验区设立; Control_Var 为所有控制变量; City 和 Year 分别为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ε 为随机扰动项。 α_1 为本文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 它捕捉了政策净效应, 其大小和显著性分别代表了实验区设立对当地收入公平影响强弱和可信度。若 α_1 估计系数小于 0 且显著, 则表明实验区设立缩小了当地城乡收入差距。

同时, 为探究政策推行过程中政策效应存在的差异, 验证实验区设立是否解除了当地的“不

公平锁定”陷阱, 以及其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在经济增速较低地区城乡中实现二次公平效应这一假设, 本文参考 Beck 等^[56]与曹清峰^[57]的研究, 构建如下的调节效应模型检验二次公平效应:

$$CV_{it} = \theta_0 + \theta_1 did_{it} + \theta_2 OriCV_i \times did_{it} + \theta_c Control_Var_{it} + City_i + Year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CV_{it} = \delta_0 + \delta_1 did_{it} + \delta_2 pgdpr_{it} + \delta_3 pgdpr_{it} \times did_{it} + \delta_c Control_Var_{it} + City_i + Year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 初始变异系数 OriCV 和人均 GDP 增长率 pgdpr 为调节变量, 用来表征初始城乡收入公平和经济增长过程公平, 其余变量含义与式 (2) 相同。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乡收入差距	CV	3 043	0.4341	0.0827	0.1171	0.6572
实验区设立	did	3 043	0.0723	0.2590	0	1
基础教育	Edu	3 043	0.0000	1.0897	-3.0505	6.5577
医疗卫生	Med	3 043	0.0000	1.0000	-1.3467	13.9925
社会保险	Insur	3 043	0.0000	1.0000	-0.7129	13.1905
基础设施	Infra	3 043	0.0000	1.2128	-0.8503	13.6552
初始城乡收入公平	OriCV2001	3 043	0.0275	0.1033	0	0.6429
	OriCV2002	3 043	0.0281	0.1044	0	0.5626
	OriCV2003	3 043	0.0291	0.1070	0	0.5773
经济增长过程公平	pgdpr	3 043	0.0955	0.0471	-0.5309	0.6406
经济发展水平	lngdp	3 043	15.6361	0.9702	12.0802	18.5507
产业结构	struc	3 043	0.9414	0.5349	0.0943	5.3482
政府规模	gov	3 043	0.1837	0.1022	0.0397	1.0268
对外开放水平	open	3 043	0.2209	0.7688	0.0003	17.4391
固定资产投资	far	3 043	0.7027	0.3218	0.0001	2.6699
储蓄能力	save	3 043	1.2975	0.7761	0.0897	20.1002

注: 本文采用第一个主成分和第二个主成分的加权求和值度量基础教育, 其方差贡献率为 75.99%; 采用第一个主成分的分值作为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和基础设施的度量值, 其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60.29%、91.74% 和 73.55%。

五、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实验区设立对当地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知, 列 (1) 和列 (2) 同时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列 (2) 进一步控制了可能影响当地城乡收入差距的其他重要因素。结果表明,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解释变量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这说明实验区设立能缩小当地城乡收入差距, 进而改善当地的社会公平。H1 得到验证。

表 2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1)	(2)	变量	(1)	(2)
did	-0.0190* (-1.6757)	-0.0216** (-2.0070)	save		0.0118** (2.1189)
lngdp		-0.0100 (-0.2050)	城市 FE	控制	控制
struc		0.0126* (1.9408)	年份 FE	控制	控制
gov		-0.0551 (-0.1131)	常数项	0.3934*** (92.3662)	0.5252 (0.7292)
open		-0.0003 (-1.3671)	N	3 043	3 043
far		-0.0095 (-1.2311)	R ²	0.1522	0.1938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t 值。下同。

(二) DID估计有效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借鉴白俊红等^[58]的做法, 构建式(5)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并验证政策试点的动态效应。

$$CV_{it} = \beta_0 + \sum_{s=1}^3 \beta_{pre-s} D_{pre-s} + \beta_{current} D_{current} + \sum_{s=1}^6 \beta_{post-s} D_{post-s} + \beta_2 Control_Var_{it} + City_i + Year_t + \varepsilon_{it} \quad (5)$$

其中, D_{pre-s} 、 $D_{current}$ 和 D_{post-s} 分别为政策试点前、政策试点当年和政策试点后的时间虚拟变量, 非实验区城市的时间虚拟变量均为0。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管理办法》, 实验区的规划期一般为6年, 本文重点考察实验区设立后6年内的动态效应。如图1所示, 在90%的置信区间下, 实验区设立前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 这说明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满足平行趋势检验条件。在政策的动态效应方面, 实验区政策效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 直至在试点政策推行第二年估计系数才显著为负。这是因为, 从实验区规划政策出台到当地依据相关办法作出调整, 再落实到基层并开始产生时效需要一定时间。进一步分析表明, 政策效应在初期并不稳定, 随着试点时间的逐步推移, 政策切实落实到基层, 政策效果逐渐增强。而在政策实施的第6年估计系数变得不显著, 这表明政策效应持续性较弱, 于验收期前后逐渐衰退。

2. 安慰剂检验

由于本文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对实验区试点效果进行评估, 为排除其他未观测到的因素对政策实施前后差异可能造成的影响, 增强基准回归的可信度, 本文将同时随机化实验组、控制组和实验区设立时间, 通过构造伪实验组和伪政策试点时间虚拟变量构成交互项进行安慰剂检验。针对179个样本城市, 每次抽取20个城市作为伪实验组, 随机给出政策试点时间, 并将整个过程重复500次, 从而得到500个伪实验组与伪试点时间交互项的回归估计系数, 其P值分布及核密度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 随机得到的估计系数集中在0附近, P值大部分高于0.1, 与基准回归实际估计系数为-0.0216具有显著差异。相关结果显示基准回归结果通过安慰剂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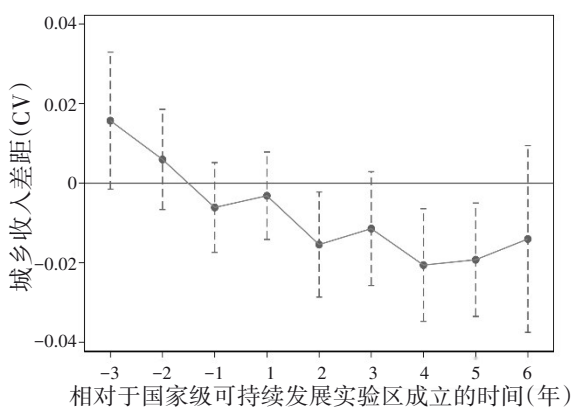


图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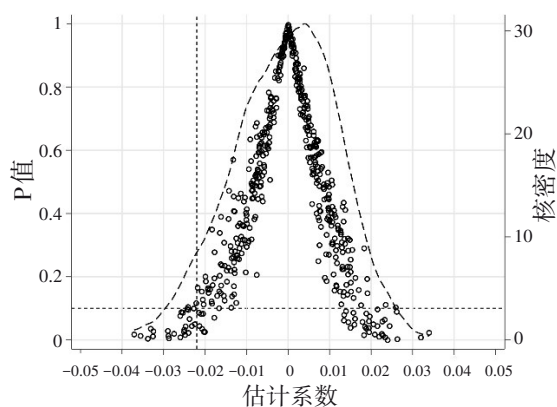


图2 安慰剂检验结果

(三) 稳健性检验^①

1. PSM-DID 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使用PSM-DID修正样本的选择性偏误, 选择不同的对照组进行回归分析。针对数据类型不匹配问题, 即PSM-DID适用于截面数据, 而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适用于面板数据, 笔者分别从构建截面匹配和逐期匹配两个视角进行PSM-DID检验。其一, 利用样本期内设立的20个实验区作为实验组, 设置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府

① 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列示, 留存备案。

规模、对外开放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和储蓄能力为匹配变量。其二, 使用1:2卡尺最近邻匹配方法, 对实验组分别进行截面匹配和逐期匹配。其三, 进行平衡性检验以考察匹配效果, 再基于式(2)进行多时点双重差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解释变量did的估计系数均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 即实验区设立能显著缩小当地城乡收入差距, 证明本文实证结论的可靠性。

2. 替换被解释变量测度指标

变异系数通过衡量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考察结果公平。考虑到城乡收入的绝对差距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当地城乡收入公平, 本文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差值的自然对数作为测度指标, 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显示, 采用城乡绝对收入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指标, 实验区设立均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对结果公平产生积极影响。因此, 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3. 排除其他相关政策的影响

排除其他相关政策对实验区政策效应的干扰, 是准确评估实验区试点政策的必要前提。结合实验区设立时间集中点和动态效应分析, 可以发现实验区设立对缩小当地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集中于2013年前后。此外, 分析其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政策表明,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不仅能够显著缩小当地城乡收入差距, 而且与实验区的试点范围和作用时间的重合度较高。实验区设立的政策效应可能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密切相关。因此, 本文基于基准回归模型(2), 加入智慧城市试点的时间虚拟变量didint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 实验区设立能显著缩小当地城乡收入差距, 而didint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由此可知, 实验区设立对当地城乡收入结果公平的促进作用并未受到其他相关政策的干预, 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四) 异质性分析

1. 空间异质性分析

从目前189个实验区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出, 其空间分布符合东南稠密、西北分散的特征。这与基于中国人口分布特征所提出的人口地理分界线相吻合。近年来, 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 胡焕庸线逐渐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学术内涵^[59]。丁焕峰和刘心怡^[60]发现, 胡焕庸线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分界线基本重合。其中, 胡焕庸线西北侧城乡收入差距明显较高, 两侧地区城乡发展具有不平衡的趋势^[61]。因此, 本文基于胡焕庸线这一经济、自然地理和人文发展的分界线, 将样本划分为胡焕庸线以东南地区和胡焕庸线以西北地区两组, 以探索不同区位特征实验区的政策效应。如表3列(1)与列(2)所示, 与胡焕庸线以西北地区相比, 实验区设立对胡焕庸线以东南地区城乡差距的缩小作用更显著。这可能是由于: 第一, 胡焕庸线以东南地区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 农村相对富裕, 可以更好地利用现有发展资源, 进一步推动城乡差距缩小。第二, 胡焕庸线以东南地区生态产品的转化机制较为成熟, 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将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效益。第三, 实验区在胡焕庸线以东南地区分布稠密, 实验区相互作用, 产生集聚效应。因此, 实验区设立对胡焕庸线以东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作用比胡焕庸线以西此地区的缩小作用更强, 未来应促进地区平衡发展, 进一步推动资源向生态脆弱的欠发达地区倾斜。

2. 实验区发展主题异质性分析

绿色是农村发展的底色, 生态资源作为促进农村发展的新要素, 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62]。本文根据2018年《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情况总结评估报告》中的专家意见, 将20个地级市型实验区划分为绿色生态型和非绿色生态型两种类型, 探索绿色生态建设与改善社会公平的相关性。回归结果如表3列(3)和列(4)所示。从回归结果来看, 实验区设立对绿色生态型实验区的政策影响显著为负, 而对非绿色生态型实验区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 绿色生态型实验区坚持“生态立区、生态优先、生态惠民”, 坚持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随着生态文

明建设的推进,生态功能进一步修复,实验区农村的生态农业和生态养殖等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绿水青山”逐步转化为“金山银山”,农民收入增加,从而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表3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 量	(1)	(2)	(3)	(4)
	胡焕庸线以东南	胡焕庸线以西北	绿色生态型	非绿色生态型
did	-0.0212* (-1.8563)	-0.0251 (-0.9405)	-0.0266** (-1.9931)	-0.0150 (-0.877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年份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737	306	2 907	2 839
R ²	0.2065	0.4631	0.2013	0.2176

六、作用机理分析

(一) 影响机制分析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分别从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和基础设施四个方面检验实验区设立通过机会均等这一改善结果公平的路径对当地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政策效应。

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列(1)为实验区设立对基础教育的影响,did的系数为0.1566,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实验区设立显著提升了基础教育的公平程度,即实验区设立通过提升当地的基础教育,有效提高个人发展能力和家庭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积累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当地城乡收入差距。列(2)为实验区设立对医疗卫生的影响,did的系数为0.2067,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实验区设立促进当地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对保障机会均等起到促进作用。医疗卫生能够保障城乡居民健康,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发展人力资本,从而缩小当地城乡收入差距。列(3)为实验区设立对社会保险的影响,did的系数显著为0.2240,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实验区设立推进了社会保险类具有包容性社会服务的发展,证明了实验区通过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缩小当地城乡收入差距,即实验区大力推广社会保险,保障弱势群体利益,阻止贫的越贫,实现收入分配结果公平。列(4)为实验区设立对基础设施的影响,did的系数不显著,这表明基础设施对缩小当地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尚未证实。这可能是因为基础设施对当地经济和收入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对城乡收入增长作用存在双重博弈:一方面,基础设施的“涓滴效应”在改变当地发展现状的同时惠及农村居民,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减少贫困,使富余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直接或间接地为农民提供就业渠道;另一方面,基础设施也可能造成大量资本、人才和政策向城市积聚,形成集聚效应,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可能会挤占农村基础设施的发展空间,城乡基础设施的不均衡发展会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对“离心力”与“向心力”的博弈,导致基础设施这一路径未能成为改善结果公平的有力抓手。以上的机制检验证实了H2的大部分内容。

表4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变 量	(1)	(2)	(3)	(4)
	基础教育	医疗卫生	社会保险	基础设施
did	0.1566* (1.9725)	0.2067** (1.9796)	0.2240* (1.8603)	0.2784 (0.917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年份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 043	3 043	3 043	3 043
R ²	0.5377	0.1535	0.3701	0.3253

(二) 调节效应分析

在实验区设立改善社会公平的过程中, 实验区内部带来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大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 从而进一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与此同时, 实验区所采取的机会均等政策, 也使得实验区内部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更加公平。除此之外, 可持续发展理念本身所具有的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内涵, 分别对实验区设立以来的社会公平变化及实验区间的社会公平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方面, 实验区设立能解除初始城乡收入较不公平实验区的“不公平锁定”陷阱, 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起到缓解甚至减少贫困的作用, 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 实验区设立对结果公平的改善作用有偏于经济增速较低的欠发达实验区, 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实验区提供可持续发展机会。因此, 本文将分别从实验区内的初始城乡收入公平和实验区间的经济增长过程公平两个视角为出发点, 分析实验区设立对于改善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促使形成结果公平的不同之处, 探讨其发展路径在实现了实验区内机会均等和结果公平后, 是否进一步实现二次公平效应, 以验证H3。

1. 初始城乡收入公平

表5给出了实验区设立改变当地不利历史条件, 使当地脱离“不公平锁定”陷阱的检验结果。由表5可知, OriCV与did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 这说明初始城乡收入公平程度对试点政策改善实验区的结果公平产生了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 即初始城乡收入越不公平的实验区, 通过实验区设立对改善结果公平的作用越强。此外, 随着分位数水平的提升, 实验区设立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在不断增强, 显著性也在不断提升。这表明实验区设立对初始城乡收入越不公平的地区的收入差距缓解作用越强, 改变了实验区初始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这一先天劣势, 消除了“不公平锁定”陷阱, 验证了实验区间收入分配的二次公平效应。

表5 初始城乡收入公平检验结果

变 量	(1)	(2)	(3)
	OriCV2001	OriCV2002	OriCV2003
did	0.0704*** (2.7784)	0.0696* (1.8983)	0.1028** (2.5120)
OriCV×did	-0.2495*** (-3.6441)	-0.2411*** (-2.6051)	-0.3086*** (-2.9200)
OriCV25%分位数结果	0.0036 (0.3400)	-0.0034 (-0.2900)	0.0044 (0.4200)
OriCV50%分位数结果	-0.0145 (-1.6400)	-0.0184* (-1.9300)	-0.0155* (-1.8300)
OriCV75%分位数结果	-0.0316*** (-3.2300)	-0.0366** (-2.3900)	-0.0380*** (-3.240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年份FE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 043	3 043	3 043
R ²	0.2036	0.2013	0.2044

2. 经济增长过程公平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可知, 从实验区的经济增长过程来看, 实验区的相关政策通过使用具有包容性和益贫性的再分配手段使实验区, 尤其是相对贫困的经济增速较低实验区的居民在发展过程中获利更多, 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增加收入, 缩小当地城乡收入差距。表6列(1)和列(2)分别报告了基准回归、pgdpr和实验区did与人均GDP增长率pgdpr交互项的回归结果, 其中, 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相较于人均GDP增长较快的地区, 实验区设立对人均GDP增长较慢的地区缩小其城乡差距的作用更好。因此, 实验区设立使得经济水平落后地区的低收入群体更好地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 脱离贫困陷阱, 实现了益贫发展, 加速了城乡融合, 实现了城乡收入增长过程中的二次公平。综上, H3得到验证。

表6 经济增长过程公平检验结果

变 量	(1)	(2)
did	-0.0216** (-2.0070)	-0.0200* (-1.9157)
pgdpr		-0.0890*** (-4.1750)
pgdpr×did		0.1302*** (2.782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城市/年份FE	控制	控制
N	3 043	3 043
R ²	0.1938	0.1998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机会均等和结果公平的双重视角,以实验区设立这一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20年1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和评估了实验区设立对当地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实验区设立能显著缩小当地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结果公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实验区的相关政策显著缩小了胡焕庸线以东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而对胡焕庸线以西北地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显著;实验区设立对绿色生态型实验区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为显著。此外,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实验区设立通过提供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等机制,构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而实现机会均等,从而促进城乡收入公平。同时,基础设施这一作用机制并未被证实。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实验区设立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有偏于初始城乡收入更不公平和经济增速较低实验区,以更加公正的方式实现了实验区间收入分配的二次公平。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以及实验区发展现状,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进一步完善实验区相关管理办法,将促进社会公平的公众诉求融入《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规划大纲》。进一步完善评估考核监管体系,将社会公平相关的机会均等和结果公平要求作为重要指标贯彻到实验区建设过程中,加强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管理。其次,总结和推广实验区的经验,为下一步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政策选点和建设路径提供思路。本文的研究结果证明,位于胡焕庸线以东南地区的实验区、初始城乡不公平程度较高和经济增速较低实验区改善社会公平的效果更好。因此,未来应鼓励在胡焕庸线以东南地区、初始不公平程度较高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建设实验区和示范区,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建设共同发展。再次,探索可持续发展中社会公平与生态文明建设融合的发展新机制。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农业发展依赖于生态文明。而农村可持续发展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改善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未来,实验区发展应统筹生态文明建设,利用好自然资源,促进农村、农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走出一条增加农民收入的绿色发展道路,一条促进社会公平的可持续道路。最后,进一步完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建设。重视实验区政策对改善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实现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险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力资本,并通过“涓滴效应”将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农村居民,改善部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现状。确保实验区内城乡居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实现发展成果共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本文为实验区设立改善社会公平提供了实证证据,为未来实验区以及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发展路径提供一些经验、教训和启发。此外,受限于相关数据的缺失,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未进一步测度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差异性,以及未考虑社会公平的制度公平等相关维度,后续有待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2.
- [2] 郑功成. 中国社会公平状况分析——价值判断、权益失衡与制度保障[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9, 23(2): 2-11.
- [3] 彭穗宁. 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公平观的思考[J]. 社会科学研究, 1994(6): 30-35.
- [4] 魏彦强, 李新, 高峰, 等.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及中国应对策略[J]. 地球科学进展, 2018, 33(10): 1084-1093.
- [5] 张晓玲. 可持续发展理论: 概念演变、维度与展望[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8, 33(1): 10-19.
- [6] 吕永龙, 王一超, 苑晶晶, 等. 关于中国推进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若干思考[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 28(1): 1-9.
- [7] LU Y, NAKICENOVIC N, VISBECK M, et al. Five priorities for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J]. Nature, 2015, 520(7548): 432-433.
- [8] 朱婧, 李秋杰, 赵文武. 中国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文献计量研究——以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和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例[J]. 生态学报, 2022, 42(21): 8914-8927.
- [9] 姜国强. 机会不均等: 收入分配失衡的经济学解析[J]. 财经科学, 2012(7): 95-102.
- [10] 俞可平. 社会公平和善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两大基石[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5(1): 10-15.
- [11] 李迎生. 中国社会政策改革创新的价值基础——社会公平与社会政策[J]. 社会科学, 2019(3): 76-88.
- [12] 王浦劬. 论转变政府职能的若干理论问题[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5(1): 31-39.
- [13] 江国华, 刘文君. 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的理论释读[J]. 求索, 2018(1): 32-38.
- [14] 李军鹏. 共同富裕: 概念辨析、百年探索与现代化目标[J]. 改革, 2021(10): 12-21.
- [15] 郭庆旺, 吕冰洋. 论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1, 46(6): 16-30.
- [16] 杨汝岱, 朱诗娥. 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吗? ——基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研究[J]. 经济研究, 2007(12): 46-58.
- [17] 王甫勤. 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收入分配[J]. 社会, 2010, 30(1): 109-126.
- [18] MARTINET V, DEL C S, CAIRNS R D. Intragenerational inequality avers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22, 144(5), 104075.
- [19] 董丽霞. 中国的收入机会不平等——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的研究[J]. 劳动经济研究, 2018, 6(1): 44-62.
- [20] 周小亮, 吴武林. 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测度及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8, 35(8): 3-20.
- [21] LIAO L, WARNER M E, HOMSY G C. Sustainability's forgotten third E: what influences local government actions on social equity?[J]. Local environment, 2019, 24(12): 1197-1208.
- [22] HOLDEN E, LINNERTUD K, BANISTER 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revisited [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4, 26(1): 130-139.
- [23] 张国庆, 胡微微. 制度规则失范与公平正义失和——现时期中国政府深化改革的必解难题[J]. 山东社会科学, 2013(5): 49-54.
- [24] 孙新章.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的回顾与展望[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 28(1): 10-15.
- [25] 彭乾, 邵超峰, 鞠美庭. 天津市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模式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 26(S1): 355-360.
- [26] 李俊莉, 丁桂英. 日照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发展状态评估研究[J]. 生态经济, 2016, 32(12): 83-86.
- [27] 张晓彤, 姚娜, 张茜, 等. 构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评估工具的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 28(9): 40-51.
- [28] 黄钰乔, 丛建辉, 王灿.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研究[J]. 中国环境管理, 2020, 12(1): 102-112.
- [29] 负杰. 公共政策评估的制度基础与基本范式[J]. 管理世界, 2023, 39(1): 128-138.
- [30] 刘炳胜, 杨中齐, 薛斌, 等.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效应评估——基于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准实验证据[J]. 公共管理学报, 2023, 20(1): 69-83.
- [31] 牛文元.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认知——纪念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20周年[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 22(5): 9-14.

- [32] 科学技术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中国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探索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6-29.
- [33] 张杰,胡海波.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及对策研究——以社会公平为分析视角[J].理论探讨,2012(2):102-105.
- [34] 何革华,刘学敏.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管理与改革创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3-31.
- [35] 刘彦随.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地理学报,2018,73(4):637-650.
- [36] 杨照,朱明,陈伟忠,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现状与发展模式研究——基于44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数据[J].生态经济,2018,34(12):54-57.
- [37] 刘学敏,张生玲,王诺.效率、社会公平与中国减贫方略[J].中国软科学,2018(5):49-55.
- [38] 丁志国,赵晶,赵宣凯,等.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效应识别与农村金融政策应对路径选择[J].金融研究,2011(7):142-151.
- [39] 李善峰.中国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4:116-165.
- [40] 陈斌开.跨越不平等陷阱[J].国际经济评论,2021(3):81-101.
- [41] 熊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与模式选择[J].中国农村经济,2002(7):36-44.
- [42] 赵玉亮,邓宏图.制度与贫困:以中国农村贫困的制度成因为例[J].经济科学,2009(1):17-29.
- [43] 关会娟,李昕,谭莹.教育投入、交易成本与区域收入差距[J].财经研究,2019,45(7):97-111.
- [44] 陈斌开,张鹏飞,杨汝岱.政府教育投入、人力资本投资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管理世界,2010(1):36-43.
- [45] 张丽君,巩蓉蓉,袁伟伦.公共服务差距与区域间收入不平等的形成——基于200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公共管理评论,2020,2(4):50-81.
- [46] 李素利,张金隆,刘汕.多维多层视角下我国社会保障政策执行效果测度研究[J].管理评论,2015,27(3):24-38.
- [47] 刘晓光,张勋,方文全.基础设施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劳动力转移的视角[J].世界经济,2015,38(3):145-170.
- [48] 叶普万.贫困经济学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世界经济,2005(9):70-79.
- [49] 杜志雄,肖卫东,詹琳.包容性增长理论的脉络、要义与政策内涵[J].中国农村经济,2010(11):4-14+25.
- [50] 王志江,胡日东.修正加权变异系数:度量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有用指标[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6):134-137.
- [51] 张嫫,方天堃.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与经济成长的协整及因果关系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7(3):38-43.
- [52] 夏怡然,陆铭.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15(10):78-90.
- [53] 张延群,万海远.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和趋势预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36(3):59-75.
- [54] 陈斌开,林毅夫.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社会科学,2013(4):81-102+206.
- [55] 葛继红,王猛,汤颖梅.农村三产融合、城乡居民消费与收入差距——效率与公平能否兼得?[J].中国农村经济,2022(3):50-66.
- [56] BECK T, LEVINE R, LEVKOV A.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0, 65(5):1637-1667.
- [57] 曹清峰.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基于70大中城市的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20(7):43-60.
- [58] 白俊红,张艺璇,卞元超.创新驱动政策是否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来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22(6):61-78.
- [59] 丁金宏,程晨,张伟佳,等.胡焕庸线的学术思想源流与地理分界意义[J].地理学报,2021,76(6):1317-1333.
- [60] 丁焕峰,刘心怡.城镇化背景下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演化[J].经济地理,2017,37(4):32-41.
- [61] 方创琳,李广东,戚伟,等.“胡焕庸线”东西部城乡发展不平衡趋势及沿博台线微突破策略[J].地理学报,2023,78(2):443-455.
- [62] 于法稳.新时代农业绿色发展动因、核心及对策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18(5):19-34.

Can the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perimental Zones Promote Social Equity: Policy Effect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DID Model With Multiple Time Periods

HONG Jing-ke¹, ZHENG Qi¹, LIU Bing-sheng²

(1.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Real Estate,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Summary: In recent years, China's development has shifted from an extensive mode to a sustainable, high-quality model, with an increasing emphasis on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o promote social equity. The principles of intergenerational and intragenerational equity are embedded in the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perimental zones (NSDEZs), and their role in improving social equity in spatial and temporal dimensions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Although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carried out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pilot work of NSDEZs,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focusing on social equity. Consequently, further exploration is required to test the policy effects and theoretical mechanisms for improving social equity.

This study uses data from 179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04 to 2020. Based on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NSDEZs, this study uses the DID model with multiple time periods to test the impact of NSDEZs on social equity and its mechanisms, focusing on both equal opportunity and outcome equity. We fin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NSDEZ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s to the improvement of outcome equity. Specifically, the positive effect on social equity i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experimental zones located southeast of the Hu-Line, as well as those with a green ecology theme. NSDEZs indirectly promote outcome equity by ensuring equal opportunities through provisions of fundamental education, healthcare, and the expansion of social insurance coverage. However,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does not emerge as a significant driver of such improvement. Further examination demonstrates that the pilot policies achieve targeted regulation at the spatio-temporal level, thus achieving social equity in a more equitable manner.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it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policy role of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fostering social equity, employing a DID model with multiple time periods to address the shortcomings of previous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policy impact of NSDEZs. Second, it comprehensively explores and test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s by which NSDEZs influence local social equity through improving access to basic education, healthcare, and social insurance. This enriches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equity within NSDEZs. Third,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intergenerational and intragenerational equity inherent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xplores and verifies the secondary effects of NSDEZs on equity.

Key words: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perimental zon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qual opportunity; social equity; DID model with multiple time periods

(责任编辑: 刘 艳)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3.11.002

[引用格式]洪竞科,郑琪,刘炳胜.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能否促进社会公平? ——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政策效应评估[J]. 财经问题研究,2023(11):15-30.